

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 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主 编

汪 坦 张复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前 言

前一阶段，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建设部科技发展司联合领导及支持下，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连续召开了四次学术研讨会，全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逐渐发展，经过各方学者们辛勤努力，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第五次会议和上次相隔较久，是在庐山管理局建设处具体协助下顺利举行的。收到论文六十余篇，内容丰富并有新的进展。作者除多数属专业学院、研究所以及规划设计院等外，还有各省市城建档案馆、建设管理委员会、文化馆、规划土地管理处等的同志们，他们通过在实践中切身体会，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

队伍阵容的扩大，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标志。

国外送来论文的有日本丰桥技术科学大学建筑工学系西泽泰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所娜塔丽、日本鹿儿岛大学土田充义和佐藤综合计画谢少明、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冯晋，说明海外青年学者对这项研究的关心。特别是长期与我们合作的日本亚细亚近代建筑史研究会代表、东京大学藤森照信教授专程来庐山就中日合作进行中国近代建筑调查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展望。

一些论文显示当前实践已向我们指出某种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如常怀生教授对哈尔滨城市开发建设中历史文化特色的消失的遗憾、曲翠松所谈关于上海近代建筑保护工作情况（伍江在小组会上也作了补充介绍）等，表明我们近代建筑史研究工作者肩负责无旁贷的使命而且大有作为。

彭开福先生的报告中关于向联合国申报把庐山名胜风景区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单位的经过，也验证了前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是颇具价值的。我们这个近代建筑史研究大家庭，家境越来越殷实了！

当然难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牵涉到今后的进一步发展。

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大致有三：

一、组织问题。

是否要成立学术研究机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此前，“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建设部科技发展司联合资助的一个项目，我以项目负责人的身分组织活动。现在此项目已结题。

二、经费问题。

三、筹办《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杂志以为研究阵地。

这亦可属经费问题。现下《南方建筑》主编郑振钦先生表示可以以其杂志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阵地，欢迎投稿，必要时可出专刊。

这次，建设部勘察设计司副司长窦以德、中国建筑学会学术部副主任王国泉莅会并讲话，发表了很中肯的意见。我想，有各级领导的支持，有各方面的帮助，有我们这个近代建筑史研究大家庭的努力，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工作一定会不断发展，取得更大的成果。

汪 坦 1996年10月

(京)新登字 0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汪坦, 张复合主编. -北京: 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ISBN 7-112-00419-5

I. 第… II. ①汪… ②张… III. 建筑史-中国-近代-文
集 N. TU-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1928 号

第五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主 编

汪 坦 张复合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兴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½ 字数: 325 千字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 册 定价: 19.00 元

ISBN 7-112-00419-5

TU · 303 (863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前言	汪 坦
中国近代建筑史“自立”时期之概略	张复合 (1)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	李百浩 韩 秀 (8)
外廊建筑形态比较研究	李传义 (13)
太原近代建筑概说	金志强 芝效林 梅 刚 亢雁直 (21)
庐山近代别墅的双重效应	彭开福 (37)
西方现代建筑传入中国的前哨站	
——哈尔滨新艺术运动建筑的特征和历史地位	刘松莅 (41)
北京近代铁路建筑初探	董晓晶 (49)
济南旧城的近代商业建筑	姜 波 (58)
北京“香厂新市区”规划缘起	董豫赣 张复合 (63)
北海市旧街区“骑楼式”建筑空间形态特征	谢 璇 骆建云 (82)
建筑技术在南京近代建筑发展中的作用	刘先觉 杨维菊 (91)
工程师站在建筑队伍的前列	
——上海近代建筑历史上技术文化的重要地位	(法) 娜塔丽 (96)
近代大连城市住宅类型的集合化演进过程	沙永杰 陆 伟 纪 雁 (107)
30年代沈阳“满铁”社宅的现代规划	包慕萍 沈欣荣 (114)
居住行为模式的冲突与住宅环境的演变——对沈阳近代日式住宅的人文研究	
.....	罗玲玲 任 蕊 崔光海 杨 胤 (125)
华西协和大学建筑考	董 黎 (135)
旧满铁大连医院本馆建设过程及历史评价	(日) 西泽泰彦 (144)
北京陆征祥家族墓庐的建筑特点及其文物价值	王和平 (156)
青岛天游园研究	徐飞鹏 (159)
晚清寓华西洋建筑师述录	黄 遐 (164)
一页沉沉的历史——纪念前辈建筑师虞炳烈先生	侯幼彬 李婉贞 (180)
庐山近代建筑史研究和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申报	欧阳怀龙 (188)
天津市广场北地区风貌建筑群的历史发展与控制性规划	何力军 (193)
城市开发建设中的遗憾——哈尔滨城市历史文化特色的消失	常怀生 (198)
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观的思考	冯 晋 (202)
后记	张复合 (207)
附录	(209)

中国近代建筑史“自立”时期之概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张复合

提要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自立”时期，中国人的建筑活动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逐渐成长，建筑设计活动兴盛；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吕彦直以南京中山陵彪炳史册，基泰工程司作为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而在全国产生影响。中国建筑师学会、上海市建筑协会、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的设计、建造和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由革命转向建设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后，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争取到足以进行建设事业的局面，即使其后的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窒息了民族工业的生机、中国并没有出现随政治革命而来的“产业革命”，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确曾出现过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

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时期。其标志是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兴办，并日益完备；中国建筑事务所陆续开业，中国人建筑师逐渐成长，建筑设计活动兴盛；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

二三十年代的近代建筑的历史中反映出了世界上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人建筑师面对列强的入侵而激发的民族意识。这两种因素的碰撞、交叉和融合，反映出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中国近代建筑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世界建筑的历史已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发展，中国建筑的历史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中行进；中国人建筑师面对着的是伴随着侵略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他们既要学习、接纳西方的现代文化，再认识、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抵御外来侵略的精神支柱，始终被一种“民族意识”所笼罩。在这种历史情况之下，中国人建筑师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使中国的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建筑学术活动在二、三十年代都得以发展。

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以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样式为特征的潮流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从样式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称此时期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洋风”时期；^[2]对于中国人的建筑活动居于主导地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活动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称此时期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自立”

时期。

虽然 30 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使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未能在这一重要发展时期的基础上走向辉煌,完成向现代化的转变,但是,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自立”时期的成果,则为其后中国建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本文试从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和学术活动三个方面,对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自立”时期作一简略记述。

一、建筑教育

根据清廷 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中国第一所官立大学——京师大学堂——就已设置有“建筑学门科目”。^[3]民国初年,在 1912、1913 年的民国政府《壬子、癸丑学制》中亦保留有“建筑学”科目。^[4]但首先作为专业进入教学的,是 1923 年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开设建筑科。^[5]

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由柳士英(1893~1973 年)任系主任,朱士圭(1892~1981)、刘敦桢(1897~1968 年)、黄祖森任教。^[6]此四人均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7]所以该校建筑科的培养目标与日本学制基本一致。^[8]1927 年 7 月,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并入第四中山大学;1928 年 5 月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系主任由留美的刘福泰(1893~1952 年)担任,其他教师也都是留学归来的。先后任教的有李毅士、卢树森、贝寿同(1876~ 年)、刘敦桢、谭垣(1903~1996 年)、朱神康、陈裕华、刘既漂(1900~ 年)、虞炳烈(1895~1945 年)、鲍鼎(1899~1979 年)等人。^[9]自 1940 年起,鲍鼎任系主任,聘梁思成成为客座教授,杨廷宝、刘敦桢为兼职教授,徐中(1912~1985)为专职教授。^[10]

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在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近现代许多著名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都毕业于这里,他们的活动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4 年毕业的张镈(1911~ 年)、唐璞(1908~ 年),1935 年毕业的张开济(1912~ 年)、徐中,1941 年毕业的戴念慈(1920~1991 年)、汪坦(1916~ 年)等,为其中佼佼者。戴念慈于 1982 年 5 月出任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是现代中国建筑师作为本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第一人。汪坦多年潜心国内外建筑理论研究,1985 年 8 月又不顾高龄毅然担起主持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任,使此项工作中断近 30 年后又得以进行。

1928 年秋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工学院创办建筑系,林徽因(1904~1955 年)、陈植(1902~ 年)、童寓(1900~1983 年)、蔡方荫先后执教。^[11]同年夏天,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创办,^[12]留学法国的汪申(1894~ 年)为系主任,华南圭、朱广才、曾叔和、张剑鐸任教;^[13]1934 年沈理源(1890~1951 年)为系主任;^[14]1938 年 7 月改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学系”,系主任为留学比利时的朱兆雪(1900~1965 年),沈理源、钟森、赵冬日(1916~ 年)任教。^[15]

进入三、四十年代,广东省立勸勤大学、私立沪江大学商学院、私立雷士德工学院、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天津工商学院、私立之江大学、国立重庆大学、湖南省立克强学院、国立唐山工学院、国立北洋大学等陆续开设建筑系。^[16]

20 年代以来的中国建筑教育多由留学欧美的教师执教,因此西方学院派思潮占有优

势，有重艺术、强调古典训练的倾向。

二、建筑设计

早在本世纪之初，两位中国人建筑师就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作过不同的尝试：供职于陆军部军需司营造科的沈琪，于1906年为陆军部衙署设计了一栋以西式为主、但颇多中国装饰的主楼；^[17]受命于两江总督的通州师范学校工科毕业生孙支厦（1882～1975年），在1909年主持设计了一栋基本为西式的江苏省谘议局建筑。^[18]

1915年左右，从业光地产公司学徒出身的上海第一位中国人建筑师周惠南（1872～1931年）率先开办建筑事务所——“周惠南打样间”，设计了爵禄饭店、一品香饭店、中央大戏院、旧天瞻舞台及1917年的大世界等建筑。^[19]

1921年，由中国人建筑师吕彦直创办的“彦记建筑事务所”开设。^[20]

吕彦直，1894年出生，1929年去世，年仅36岁。但他以设计并主持建造南京中山陵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地位，彪炳史册。他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3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曾追随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Henry K. Murphy, 1877～1954年），1920年先同过养默、黄锡霖合组“东南建筑公司”，后又与黄檀甫设立“真裕公司”。吕彦直去世后，由彦记事务所建筑师李锦沛（1900～ 年）接替完成中山陵工程。^[21]

1926年4月吕彦直和结构工程师李铨、冯宝龄合作设计，由上海馥记营造厂施工建造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全部楼座用悬臂钢架，屋顶用跨度约30米的四个三角形桁架成45°相交，构成八角攒尖顶，是中国近代跨度最大的会堂建筑。^[22]这种在大体量建筑中运用中国传统宫殿样式的尝试，对于中国后来的建筑创作有一定影响。

1920年，关颂声（1891～1960年）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21年在天津成立“基泰工程司”。朱彬（1896～1971年）、杨廷宝（1901～1983年）分别于1923、1927年加入。^[23]基泰工程司（Kwan, Chu and Yang）是中国近代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建筑事务所，在其成立后的二十六、七年时间里，在中国有相当影响，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重要工程均出自基泰之手。^[24]

杨廷宝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设计的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将自然地形与建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建筑物有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建筑都是他运用中西建筑的处理手法，不墨守成规，刻意创新的成果。他的设计作品，在30年代初期就已驰誉南北，成为当时的名建筑师之一。^[25]

1922年，柳士英、朱士圭、刘敦桢和王克生（亦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创办了“华海公司建筑部”。其设计作品遍于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地。^[26]

1914年从美国伊利诺大学留学归国的庄俊（1888～1990）、1922年从美国归国的范文照（1893～1979年）、1927年从美国归国的董大酉（1899～1973年），也分别组建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庄俊建筑事务所”（1925年）、“范文照建筑事务所”（1927年）、“董大酉建筑事务所”（1930年）等。

1930年，赵深（1898～1978年）开办“赵深建筑师事务所”；1931年改为“赵深陈植建筑事务所”后，童寓于冬天来上海加入，赵深陈植建筑事务所于1933年1月1日改称

“华盖建筑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 Shanghai），亦是中国近代一支极为重要的建筑设计力量，在上海、无锡、桂林、贵阳、昆明等地主持设计了许多建筑项目。^[27]

1930、1932年徐敬直（1906～ 年）、李惠伯（1909～ 年）先后自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归国后，同杨润钧一起三人合伙组建“兴业建筑师事务所”。三、四十年代，奚福泉（1902～1983年）的“启明建筑事务所”，陆谦受（1904～1991年）、黄作燊（1915～1975年）、王大闳的“五联”，李宗侃的“大方”，黄元吉（1901～ 年）的“凯泰”，以及“伟成”、“东亚”、“华信”、“大地”、“信怡”、“天工”等建筑事务所（或名“建筑工程司”）也陆续出现。^[28]

据不完全统计，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天津、北平、南京、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建立的具有一定水平的建筑事务所约有30余家。^[29]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创作的许多重要建筑物，都成为今日中国的宝贵财富。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后于1929年所作“首都计划”，则是中国近代建筑师进行的较早、规模较大的城市规划设计。^[30]虽然“首都计划”完全舍弃了原有城市基础而重新建设，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都不能允许，因此很难完全实现，但是，这在二十年代是一种开创性的设想。

中山陵园总体平面呈钟形，引人发“木铎警世”之想，寓意深远；墓在祭堂后合乎中国观念，式样采古制，建筑朴实坚固，形式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首都计划”的详细方案中，全部政府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造型，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其目的不外为发扬光大本国传统的文化。——中山陵的设计和南京“首都计划”，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建筑师的心态。

三、学术活动

中国近代建筑史“自立”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建筑团体先后成立，学术活动得以开展。其中，中国建筑师学会、上海市建筑协会、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建筑的设计、建造和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建筑师学会与《中国建筑》

1927年10月，留美回国的建筑师张光圻（1897～ 年）、吕彦直、庄俊、巫振英（1893～ 年）、范文照等人，以联络同业、组织团体、冀向社会贡献建筑事业为宗旨，发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人建筑师自己的组织——“上海建筑师学会”。第二年呈请国民政府工商部备案注册，使加入人员范围不断扩大，入会人员已不仅限于上海，因此改称“中国建筑师学会”，并设分会于南京。^[31]

中国建筑师学会在1928年6月制定了《中国建筑师学会章程》、《建筑师业务规则》以及《中国建筑师学会公守诫约》。据1931年《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录》，当时已拥有正会员39人、仲会员16人。正会员39人中，有37人曾留学国外（美国29人、英国2人、日本1人、法国2人、德国2人、比利时1人）；仲会员则全未曾出国留学过。到1933年，会员已发展到55人，会长董大酉、副会长庄俊。

1931年10月，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办了《中国建筑》杂志，融合东西建筑学之特长、以发扬中国建筑物固有之色彩，是其办刊宗旨。

中国营造学社

1929年,朱启铃(1871~1964年)在北平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以整理国故、发扬民族建筑传统为宗旨。这是中国人组织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群众学术团体。

朱启铃曾于1904年任北京外城警察总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1912年后历任中华民国内阁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之职。他对中国建筑很有研究,曾对早期北京的市政建设作出过不少贡献,可以说是把北京从封建都市改建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一位先驱者。^[32]他在30年代还曾亲自作过改建北京东安市场的提案。^[33]

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法式组研究中国古建筑结构,由梁思成主持;文献组搜集资料,由刘敦桢主持。梁、刘二人分工合作,率领学社其他同人,足迹踏遍十六省、二百余县,涉猎建筑文化、城乡民居及传统城市计划等二千余单位,为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开创了自己的道路。营造学社出版印行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季刊)等多种刊物,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人材的培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34]

营造学社在其存在的17年间(1929~1946年),为中国创立了“中国古代建筑史”这个科学技术史的分支学科,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积累了基本资料,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教育、保护工作培养了人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保存、保护作出了贡献。

上海市建筑协会与《建筑月刊》

1930年春,上海市建筑界三十余家发起成立“上海市建筑协会”,以研究建筑学术,改进建筑事业,并发扬东方建筑艺术为宗旨。协会于1932年创办《建筑月刊》杂志,以科学方法改善建筑途径,谋固有国粹之亢进;以科学器械改良国货材料,塞舶来货品之漏卮;提高同业知识,促进建筑之新途径;奖励专门著述,互谋建筑之新发明。^[35]

《新建筑》

1936年,广东省立勸勤大学建筑系学生创办的《新建筑》杂志,反映了世界上现代主义建筑潮流的影响,主张反抗现有因袭的建筑样式,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36]

抗战爆发后,《新建筑》在重庆复刊,明确倡导现代主义建筑。^[37]但是,在当时战争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没有正常的建设环境,现代主义建筑只能流于空谈。

附 注

[1] 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又见[法]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

[2] 见拙文“中国近代建筑史‘洋风’时期之典型”,载《清华大学建筑学术丛书》第六分册《建筑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10月。

[3] 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月,第610~611页。

[4] 同上,第662~664页。

[5] 柳士英:“回忆录提纲”,载《南方建筑》1994年第3期,第55页。

[6] “关于中大建筑系创建的回忆”(张镛森遗稿,王惠英整理),载《建筑师》第12期,1982年10月。童寓、晏隆余:“中国建筑教育”,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第564页。魏春雨:“纪念柳士英”,载《建筑师》第40期,1991年3月。

- [7] 徐苏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与柳士英”，载《南方建筑》1994年第3期，第12页。
- [8] 同[6]。
- [9] 参见“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历史”，载《中国建筑》Vol. 1, No. 2, 民国22年8月。又见张镈：“从东北大学到中央大学”，载《建筑师》第48期，1992年10月。
- [10] 陈端本：“建筑巨匠——鲍鼎”，载《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1月。
- [11] 童寓：“东北大学建筑系小史”，载《中国建筑》创刊号，1931年11月。又见[9]之张镈：“从东北大学到中央大学”。
- [12] 麟炳：“中国建筑”，载《中国建筑》Vol. 1, No. 1, 1933年7月。
- [13] 《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同学录》（民国18年）。
- [14] 《中国教育年鉴》（第一次）。
- [15] 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1992年5月，第2：23页。
- [16] 参见[6]之童寓、晏隆余：“中国建筑教育”。又见“广东省立勸勤大学25年度概览”（民国26年3月）；黄家骅：“沪江大学建筑系创建历程”，载沪江大学校友会编《纪念册》，1986年；郑朝强：“雷士德工学院”，载《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工商建筑》第一号，工商建筑工程学会，民国30年10月。赖德霖：“关于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史的若干史料”，载《建筑师》第55期，1993年12月。
- [17] 赖德霖：“实测报告2. 清末陆军部南楼”，载《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9~56页。
- [18] 刘先觉、杨维菊：“南京近代建筑概说”，载《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2月，第6页。又见陈伯冲：《近代南通建筑及城市研究（1840~1947）》（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5月，第26~30页。
- [19] 参见张钦楠：“记陈植对若干建筑史实之辨析”，载《建筑师》第46期，1992年6月。
- [20] 林克明：“吕彦直”，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第312页。
- [21] 刘凡：“吕彦直及中山陵建造经过”，载《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7月，第135~145页。
- [22] 马秀之：“广州近代建筑概说”，载《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广州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2月，第6页。又见傅朝卿：《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南天书局，1993年12月，第121~124页。
- [23] 张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2月，第12~13页。
- [24] 同上，第18~58页。
- [25] 参见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8月。
- [26] 参见“柳士英建筑设计作品目录（部分）”，柳道平提供，载《南方建筑》1994年第3期，第49-50页。
- [27] 范守中：“赵深”，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第543~544页；晏隆余：“童寓”，出处同前，第436~437页。又见方拥：“建筑师童寓”，载《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华中建筑》1987年第2期），第83~89页。
- [28] 曾坚：“中国建筑师的分代问题及其他”，载《建筑师》第67期，1995年12月，第85~93页。
- [29] 参见肖桐主编《当代中国的建筑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38页。
- [30] 刘先觉、杨维菊：“南京近代建筑概说”，第11~12页。又见吴光庭：“《首都计划》挑光细读”，载（台北）《雅砌》月刊1991年5月号，第38~43页。
- [31] 范文照：“中国建筑师学会缘起”，载《中国建筑》创刊号，1931年11月。
- [32]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河北省秦皇岛市委统战部合编《螭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

[33] 朱启钤：“王府井大街之今昔（附东安市场）”，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二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2月。214页。

[34] 陈明达：“中国营造学社”，载《中国大百科全书 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第586页；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10月。

[35] 何重建：“杜彦耿与《建筑月刊》”，载《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88～193页。

[36] 参见“创刊词”，《新建筑》1936年第1期。

[37] 参见林克明：“国际新建筑会议十周年纪念感言”，载《新建筑》（战时刊）第7期。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

武汉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李百浩 韩 秀

提要 该文就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问题提出了若干见解。

一、对“近代”的再认识

始于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传播到全世界,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近代合理主义”的思潮。科学的合理主义与人文主义共同构成了近代社会的时代精神。根据这样的近代合理主义,近代城市规划采用单纯的功能方法,通过提高土地利用、交通、卫生等功能的效率性、方便性、合理性,成为安排城市中物质功能的依据。

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之后,出现了寻求个性、借鉴过去的“后现代(Post-modernism)”,从而使近代城市和建筑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然而,不仅是规划建筑界,其它领域也在对“近代之后”进行探索。虽然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但至今并未确定能够超越出“近代主义”框框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价值观。正如“后现代”这个词一样,是向下一个价值观转换的过渡期,处于探索新的价值观的多元状态之中。对回归过去的探索,虽然注入了很大的力量,但对“近代的再认识”究竟如何进行,至今仍众说纷纭。对于我们来说,为了跳出近代,创造新的价值观,有必要弄清楚“近代主义”、“近代的规划”,尤其是欧美近代城市规划思想传播到中国后而造成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究竟是什么?近代主义中,什么是应该否定批判的?否定什么?什么还应该保留、延续下去?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重新认识和研究仍是十分重要的。

二、国外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动态

1. 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兴起

在欧美60年代,从历史角度研究城市规划史的组织 and 学者不断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在这个时期,其它各个学术领域,都以回顾历史为时尚。例如,通过研究产业革命的遗迹而出现的产业考古学就是一例。城市规划史作为整个历史的一个部分,从交通学、土木学、建筑技术学、地理学等来研究城市发展历程也产生于这一时期。第二,城市规划的内容与本质已发生了大的变化。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作为设计,而是逐渐显示出规划作为政策的意义。因此,须从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化学等方面来重新认识。第三,60年代的城市规划教育中,迫切要求回答规划师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进行规划?城市规划的原点究竟在

哪里？现在以及今后城市规划职业的地位将作如何改变？

2. 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动态

由于对城市规划历史的关心，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论文和出版物。例如，在美、英等国，把城市规划史作为学位论文课题的数量逐渐增加，且在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对近代城市规划进行批判反思的研究也逐渐得到认同。国与国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逐渐活跃起来。比较研究并非局限于城市规划学科，诸如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也是如此。

可以说，60年代是欧美近代规划史研究的启蒙期，在20多年的发展中，最具代表的研究组织与机构，首推英国的城市规划史研究会(Planning History Group)。该会成立于1974年，已拥有会员300多人，一年三次出版杂志Planning History Bulletin，一年两次在英国国内召开例会。1986年起，开始从历史学角度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并出版名为Planning Perspective的学术杂志。此外，作为国际性学术活动，1977年会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国际城市规划会议，1980年在芬兰又以“1890~1940年的大城市”为主题召开了第二次。如果说这两次会议是以欧美为中心进行国际交流的话，那么1988年在日本东京以“城市规划体系的国际交流史”为主题的第三次国际城市规划史会议，便标志着东亚的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3. 东亚地区的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现状

日本，是亚洲最早研究近代城市规划史的国家。1984年在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中，设立了“城市规划史小委员会”，由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的石田赖房教授任首届委员长。作为小委员会，进行了与城市规划史相关的必要基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以及1888年东京市区改正条例制定以来的近代城市回顾史的研究，进行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史上重要人物的“Who was who”的人物抄录等活动，出版了“城市规划史研究之魅力与方法”专集（《都市计画》144号）。石田赖房教授的研究中心是以实际的城市规划为课题，从历史角度对城市规划的技术、思想、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的著作有《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百年史》、《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以及众多的专题论文。东京理科大学的渡边俊一教授则以比较城市规划论研究欧美近代城市规划传播至日本之后的近代城市规划史。著有《城市规划的产生：从国际比较角度看日本的近代城市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认为，战前日本对台湾、朝鲜、中国大陆侵略占领时所进行的城市规划活动在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把它作为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70年代末起进行了一系列的系统研究。主要有越泽明的《殖民地满洲的城市规划》（1978年）、《中国东北城市规划史研究》（1982年东京大学博士论文）、《满洲国的首都规划》（1989年）和《哈尔滨的城市规划》（1989年）等。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十分活跃。当然研究的目的则与我们不尽相同。

在朝鲜半岛，汉城市立大学的孙祯睦教授对日占时期韩国城市规划史进行了系统研究，1991年出版了《日帝强占期的韩半岛城市规划》一书。主要内容为：（1）序言；（2）市区改造规划；（3）市街地规划令制定之前的倾向与京城（汉城）城市规划方案；（4）朝鲜市街地规划令的制定及其适用性等。

在台湾，是以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室的黄世蒙教授为中心的研究者对日占期城市规划史开展了系统研究。相继出版了《日占期台湾城市规划之政经脉

络及历程》、《日占时期台湾城市规划范型之研究》、《台湾城市规划历史之初探（1895～1945）》等著作。还整理出版了1937年台湾总督府（伪）编的《台湾城市规划讲习录》。

在大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长期以来忽视了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文革后，以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为主的研究者们，在较短时间内，编著了《中国城市建设史》，可以说是我国第一次真正接触近代城市规划史。近年来，由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兴起和国外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关心，引起了个别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志向。但总的说来，片断的多，系统的少，个别国史方法的多，比较国际史方法的少。

三、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意见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与意义在于：第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却面临着与一个世纪前欧美相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与其借鉴学习欧美用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实践之后的经验教训，倒不如认真地从历史中总结分析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在中国“实验”之后的接受、遭遇和变化情况。虽然中国近代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但不可与今天中国城市对外开放同日而语。当然，历史的经验教训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和意义。第二，由于战争、规划人员的撤离，政权的更替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近代的城市规划活动似梦幻中的事实。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说明这一段梦幻的事实，可以推动中国城市史及中国近代史的深入，不失为深刻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具有现实意义。第三，战后有关第一时期城市规划的文献、图书、图纸等资料有日渐消失之势。通过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可以重新有系统地汇编整理重要资料档案，以免影响今后研究的开展。这一工作，从文化学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与国史文献资料、国语辞海的编纂同样重要。

依据欧美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内容和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特殊性，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可大致概说如下：

1.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内容

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的初期，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在欧美诞生的近代城市规划，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尽管这一段城市发展史为时短暂，但发展之迅速，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步入近代，同时也使中国城市打上了近代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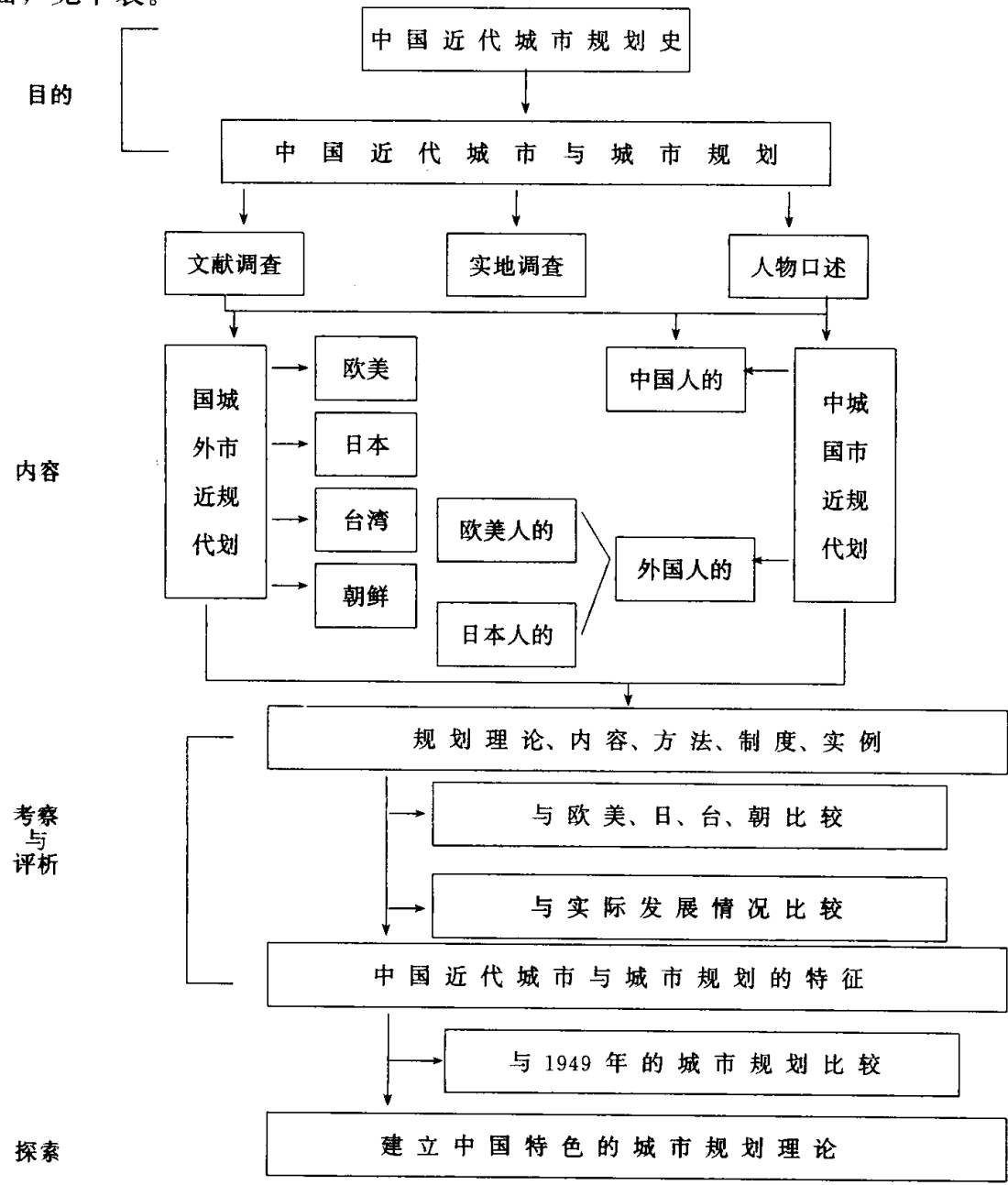
作为古代城市规划与当代城市规划之间的转变时期，中国城市在近代的变化、近代中国人的城市规划活动，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中重要的部分。近代中国人的城市规划活动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居于主流。外国人的城市规划活动虽然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一种外部影响，对于中国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内容，从时间、空间范畴上看，具有以下特点：

（1）时间上，欧美作为近代城市规划的发源地，近代城市规划史是以近代城市规划原理所完成的城市规划历史。在中国，只是在1840年以后，西方建筑和城市规划才传播开来，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应包括模仿近代之前（近世）西方古典城市规划原理（如巴洛克规划）在中国大地上所完成的城市规划（如大连、哈尔滨等）以及依据近代城市规划原理所

完成的城市规划（如长春、大同、上海等）。1949 年以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将时间限定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是为合适的。

（2）空间上，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就其空间范围而言，原则上应以在中国所进行的城市规划活动为中心。但因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特殊性，其范围要涉及到欧美、日本、朝鲜半岛和台湾等地。研究重点应以非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概念的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实践、遭遇为主，探讨和评析这一时期的规划思想、内容、制度与技术等方面，见下表。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框架图

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

着重于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相关文献，包括城市规划图、规划说明书、法规、城市地图、照片、地方志、当时的年鉴报告、调查报告、出版物、旅游指南、回忆录、报纸等，同时，将这些资料整理、汇编、判断，也可以为以后继续研究提供系统的资料。

具体地说,收集范围应是:①与中国近代城市形成、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日、美、英、德、俄等欧美各国在各自国内以及中国所进行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的文献(以原始文献为主)。②同时期日本在台湾、朝鲜等地进行的城市规划方面的文献。③当时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城市规划方面的文献。

(2) 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一方面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另一方面可对照实际的发展,提供研究者的地点感,有助于资料的掌握、解释和理解。如果能对保持当时规划面貌较完整的街区进行亲临实境的体验,将会对研究思路有所启迪。

(3) 人物口述

人物访问的方法除了可以提供客观性的资料外,更可提供有用的解释性和评价性资料,以便减少研究者的盲目臆测。其主要访问对象有两种:①城市规划的参与者:听取他们的亲身回忆,可以收集到许多实际资料,也可以了解理论与实践的差距。②城市的老市民:他们可以提供当时城市活动与城市规划中可贵的记忆资料。

3. 比较近代城市规划史论

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适合“个别国史”的方法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需要“比较国际史”之方法。这是因为: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美圈的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实际上是欧美城市规划的传播、吸收、模仿的过程。第二,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使得日本、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朝鲜的近代城市规划中,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进行中国城市规划的日本人来看,华北、华中的来自于日本的内务省;华南和“满洲”的则分别来自于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总督府、朝鲜总督府。战后他们回到日本,成为日本战后规划界的要人。日本在中国所进行的带有实验性质的城市规划实践,实际上曾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城市规划。

结 语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需要研究者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又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本文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考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问题的思路,旨在求教于关心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同行。

参考书目

1. 寄崎高弘:“欧米にわけり都市計画史研究”,《日本都市計画》,1987年,144(3)
2. 李百浩:“1945年前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与特点”,《城市规划汇刊》1994年,(5)。
3. 李百浩:“欧美近代城市规划的重新研究”,《城市规范汇刊》,1995年,(2)。

外廊建筑形态比较研究

广东省高教实业公司 李传义

提要 最早传入中国的带有西式风格建筑样式是“外廊建筑”。其传入是在1840年之后,最早是在广东。本文结合实例从外廊建筑的平、立面形式两方面对中国近代外廊建筑形态进行归类分析。

建筑史学界通常认为鸦片战争以前西洋人的建筑活动为中国近代建筑的萌芽阶段,鸦片战争之后的建筑活动才是中国近代建筑的起源阶段。而在起源阶段,最早传入中国的带有西式风格的建筑样式就是“外廊建筑”。

这种建筑样式曾被认为“起源于印度殖民地,它是18世纪中,英国殖民者为了克服印度的酷暑,在无可奈何之中发明的建筑形式”。^[1]其特征是建筑周围设置开放的外廊(Veranda)。

这种建筑形式在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从鸦片战争前后到20世纪初),并非昙花一现。起初,这种样式仅用于领事馆及领事官邸建筑,后来逐步被广泛用于各种商行、会馆、学校、洋行、银行和民宅。几乎一度成为19世纪后半叶一种通用的样式。它对促进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过程起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这种特殊的建筑式样并未引起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视。一方面由于这种建筑样式曾经流行的时代,人们没有对它进行准确的记录,另一方面许多建筑史家一直把它看作是西方建筑的一个支流不予注视。^[2]尤其是以往人们给这种建筑披上了一层殖民主义的面纱,使人们难以涉足这方面的研究。

自1985年清华大学汪坦教授发起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这一课题以来,迄今为止已经历了11年研究历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汪坦教授又主持开展中日合作对全国16城市的近代建筑进行调查与测绘,先后编辑出版了16城市近代建筑总览,召开了五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近代建筑研究者们从各个地区、各个侧面探讨中国近代建筑的起源、发展与衰亡的普遍规律,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为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建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学者对外廊建筑样式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从老一辈的近代建筑史家村松贞次郎先生到当今藤森照信先生领导的日本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的村松伸、西泽泰彦、寺原让治、田代辉久、伊藤聪等,他们都在外廊建筑方面进行了许多定性研究。他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对近代建筑进行调查和测绘,由于这项研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所以许多近代外廊式建筑得以保存下来,并由政府指定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实际上,日本与西方接触比中国晚,近代西洋建筑(包括外廊样式)是经东南亚进入中国后,才传入日本的。但日本明治时期的近代建筑大都能保存下来,通过保护更新、复原和再利用,使这些历史建筑成为现代城市和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其原因在于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日本近